

# 沿著“絲綢之路”從西方到中國

羅利路\*

## 前言

本文試圖總括和涉及在葡萄牙人抵達中國之前的情況。歐維士於1513年在廣東省的大嶼山樹立了一塊發現紀念碑，但是直到在1554年蘇札與廣東省的中國地方當局負責人達成口頭協定之後，葡萄牙人才獲得了地方當局的許可，在香山縣的一個港口——澳門安頓了下來，在此展開貿易，於是形成了16-17世紀期間，葡萄牙人稱之為中國上帝之城，或簡稱澳門的城市。

“絲綢之路”一般用來指從遙遠的時代起，那一系列通過陸路和海路聯接中國和西方的途徑。必須指出的是“絲綢之路”這種稱呼是一種現代的叫法。在遠古和中世紀的記錄中並無此種叫法。它產生於19世紀末，是由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首創的。有些學者甚至討論將它作為一種分析的概念來運用是否合適，因為“絲綢之路”的概念非常廣泛，難以掌握，因為它涉及到了不同空間與時間中變化多端的情況，例如，“絲綢之路”及與它有關各族人民的情況，此外，“絲綢之路”也作為比喻使用。

共有三條主要的“絲綢之路”：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和兩條陸地“絲綢之路”。考慮到“絲綢之路”對近代西方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澳門的開埠、發展及生存，我們將詳細敘述海上“絲綢之路”。

在古代，上述“絲綢之路”主要的範圍是：遠東、中亞，包括東南亞，印度，阿拉伯半島，地中海沿岸的北非，中歐及西歐。隨著近代的到來及首先由葡萄牙人開通的好望角航路而形成全球化商業網絡，這條航線將傳統的“絲綢之路”聯繫了起來，而且直接將歐洲同中國聯繫了起來，同時也首次以固定航班將美洲和澳州聯繫了起來，並進一步加強了同非洲大陸的聯繫。

---

\* 葡萄牙里斯本市政廳歷史研究員。

我們將看到，在不同地區和文化之間，人員及貨物的交流在不同的社會中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這樣，它們不僅運載了絲綢和瓷器，同時也傳輸了絲綢和瓷器那巧妙的製造技術。從歐洲人方面來講，他們獲得了新技術，例如造船、天文學和地圖學。這些都是工業革命必要的技術。西方的飲食習慣也隨著香料和茶的引進而發生了變化。在東方開始種植其他植物，例如來自美洲的馬鈴薯和玉米，還有非洲的植物。社會習俗，例如衣著方面至今仍然崇尚精美的絲綢。遇到各種慶祝活動，在西方開始燃放令人賞心悅目的焰火助興（現在我們居然忘記了它起源於中國）。在思想方面，相互影響尤為強烈。這反映在佛教、伊斯蘭教、景教及基督教的傳播上。“絲綢之路”本身便是一個大熔爐，它彙集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哲學模式，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它是以國家官僚精英為基礎的。這影響了歐洲啟蒙時代的哲學，同時歐洲自由主義的理想和解放的思想也影響了亞洲的精英。

自然，“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發展完全取決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的發展，以及取決於它同西方的宗教和科學關係。漢朝的國家統一為抵禦蒙古人的入侵創造了條件。在漢武帝時代，再一次抗擊了匈奴的入侵，同其他位於更西的地方，當時稱之為西域的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後來稱玉門關以西的地方為西域。同時，中國公主與匈奴的和親也保證了和平，但是每年要數次送“禮”（絲綢等）。匈奴將剩餘的絲綢與位於更西邊的人民進行交換，最後到達羅馬人手中。

## 陸地“絲綢之路”

就陸地“絲綢之路”而言，西安（古稱長安）當時是中國的始發或抵達點。漢、唐期間，長安有幾千名外國人（從商人、外交使節到學生）。它距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7000公里。此處時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且是“絲綢之路”的終點站。陸地帝國的鞏固為陸地“絲綢之路”帶來了更大的穩定。西方有羅馬帝國，東方有中國的漢朝帝國，還有位於包括阿富汗和印度北部的高昌國及波斯帝國。後來又出現了阿拉伯帝國。最後出現了蒙古帝國。這些帝國都產生了某些穩定的效果，因此不斷更新了“絲綢之路”上的商隊。

談到“絲綢之路”，自然要談到由西漢張騫開通的道路。它已經過了天山南麓，越過了甘肅的玉門關，進入了戈壁灘。

傳統上認為的張騫開通的道路是中國人首次對中亞的探查。它形成了一條重要的聯結東亞和中亞的洲際交通要道。張騫是漢武帝派遣的使節，曾兩度（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出使。搜集了許多地理、政治及經濟情報，並且企圖與大月氏（位於目前的阿富汗北部）結成聯盟，目的是想獲得它的軍事援助來抗擊匈奴。這條通道始於長安（今稱西安），途經隴西（臨洮）、酒泉、敦煌、過玉門關、焉耆、龜茲庫木（阿克蘇）、疏勒（喀什），在向北通過泊米爾（蔥嶺）地區直至蘭石城（大夏）石。在歸途中，張騫從南側繞越了帕米爾（經過了莎車、玉田、鄯善），又從北部繞過了祁連山（但是它怎於程得敦煌與酒泉以南），最後他回到了隴西（臨洮）和長安（西安）。

漢朝在張騫通西域後，每年都派遣近5到12個政治經濟使團出使西域國家。有些使團成員多達百人。商業交流的貨物包括大量的絲綢和棉布，主要貿易對象是匈奴，然後從他們那裏再換來馬匹。據估計，在公元前3年，交易了3萬匹絲綢和15000公斤的棉花。“絲綢之路”上每年的貿易額是6,970,000元（相當於100萬英鎊）。

儘管我們知道，在張騫之前，已經有兩條用來在中國和西方之間運輸絲綢和其他貨物的道路。在春秋期間（公元前770-前256年）及戰國時代（公元前476-前221年）。一條北上，基本是沿著北緯50度。它穿過西伯利亞廣袤的草原，通到阿拉海，經過里海，然後再到黑海，最後抵達君士坦丁堡。另外一條被稱之為“西南絲綢古道”。它起始於四川省的成都（它在歷史上有15個絲綢市場。現在已經確證，它們位於主要城市中。其錦緞聞名遐邇）。它沿著四川和雲南之間的古道通向緬甸、印度、阿富汗及前蘇聯（在梅爾沃，目前土庫曼斯坦的馬里的地方與另外一條“絲綢之路”會合），然後再通向伊拉克，最後越過地中海。從成都開始向大理和永春出發，然後再向南不同的地方分支，抵達孟加拉灣及緬甸，其終端是巴塞因和毛淡棉這兩個城市。還有另外一條道路是向東北，從大理通向昆明，然後再到越南的河內和海防。從永春通印度，先是經過西北到達高哈蒂，然後再由此向南抵達孟加拉灣和印度，再經過加爾哥達和更南面的馬圖拉與烏賈因。

“絲綢之路”也有其政治、外交用途，我們在此僅舉一例。隨著眾多的商人商隊，許多外交使團也是經過東南亞這條“絲綢之路”進來的。其中有撣國（它位於目前緬甸的東北部）的使節。它在公元97年、120年及131年通過這條“絲綢之路”向中國遣使。第二個使團有樂師，在東漢的首都洛陽大受歡迎。此次使團大獲成功。中國皇帝賜給了撣國王一枚金印、絲綢及一正式封號，以紀念雙方之間友好關係的開端。802年，驃國（目前的緬甸）的一個更大的使團也帶著樂師和舞師，拜見了唐朝的德宗。此次使團的影響很大，甚至留下了有關的讚美詩句。

通過“絲綢之路”進行哲學與宗教主要學派的傳播與相互影響，我們還可以列舉東南“絲綢之路”。它連接了兩個最大的佛教國家（印度和中國），同時也連接了東南亞的其他國家。通過它傳播了不同的佛教派別，例如小乘佛教（16世紀以後，主要流行於緬甸）及大乘佛教（從四川地區向雲南大理傳播）。不同思想及文化模式的流傳也在建築上留下了痕跡。我們看到，大理地區有崇聖三塔（儘管有16層，共58米高，歷史上經歷了地震而屹立不倒）。在江川石窟的墓穴及石雕上，我們看到了不同文化的遺跡。

絲綢在羅馬社會日常生活和時尚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至於羅馬當局將其視為一經濟問題。支付這些絲綢和其他東方的貨物必須使用貴重金屬，例如著名的羅馬金幣。羅馬元老院曾經干涉此事，企圖規定只有婦女才可以使絲綢。但是這個措施遠遠不足，這使得提庇留在公元22年警告元老院說：“這些滿足女人虛榮的物品、珍寶及小的奢侈品將帝國所有的財富都流到帝國之外，換來卻是亂七八糟的東西。將帝國的金錢送給了外國，甚至是送給羅馬帝國的敵人。”後來情況進一步惡化。根據著名作家老普林尼的估計，羅馬帝國當時每年進口絲綢的款項高達487,900元（相當於7萬英鎊）。托勒密儘管對遠東有著很詳細的知識，但是他的知識也還是十分有限而模糊的。他將中國形容為兩個不同的國家，一個是秦奈的“秦那”（那裏便是《厄利特里亞海遊記》中的秦奈）。另外一個叫“塞里卡”。托勒密說，“‘秦奈’的北部可通‘塞里卡’。其東部的子午綫便是印度以西未知地的分界。”同時還說，航海家們敘述說，比秦那更遠的是塞里斯國和塞拉城。在許

多世紀中，秦那是可以通過海洋達到的地方，而塞里卡卻位於中國的北部，只有通過陸路才可以抵達。經過了漫長的世紀後，直到17世紀才由葡萄牙人涅本多準確無誤地證明了這兩個國家實際上就是同一個中國。

東、西方關於“絲綢之路”的文獻汗牛充棟。隨著年代的推進，離開古代，進入中世紀和現代，研究越多。中國人的史學非常發達。每朝的正史，都有地理志，還有各種零散的個人記載。在阿拉伯史學方面，我們要著重指出的是蘇利曼的《中國及印度遊記》(851年)及伊本白圖塔的遊記(1330年)。從西方史學而論，我們要著重指出的是老普林尼、托勒密及匿名的《厄利特里亞海遊記》。中世紀旅行家留下的遊記者幾乎都是宗教人士。這證明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聯繫很密切。為我們留下遊記的人有：伯朗嘉賓(教皇於1247年派往中亞的使節)，1252年由聖類思派遣的僧侶盧布魯克。由教皇派遣的數個方濟各會修士：約翰·蒙特·科維諾於1289年，安德烈·佩魯賈於1310年，鄂多立克於1314年和約翰·瑪黎諾里於1340年。但從馬可波羅(1254-1324年)所寫的《馬可波羅遊記》起，中國通過它的蒙古名字契丹才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然而，不僅僅是歐洲人，而且有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也來到了中國。同時，也有中國人到了歐洲。北京地區的蒙古人列班·掃馬是景教的僧侶，他於1287年來巴黎晉見法國國王“美男子”飛利浦，建議構成一個攻打伊斯蘭的聯盟。

我們再來詳細地看一下這些長途跋涉的使節的情況。伯朗嘉賓(方濟各會修士，約60歲)於1245年由教皇因諾森四世派遣出使中亞，以便建立與蒙古人的和約，並將蒙古人皈依(但是蒙古大汗窩闊台於1241年的逝世中止了對歐洲的入侵，但他們已經抵達了多瑙河)。他於1245年4月離開里昂。於1246年在和林參加了新的蒙古皇帝貴由的加冕儀式。他獲得了接見，並且拿得到了給教皇的回信。在此信中，蒙古君主要求教皇臣服於他。此次出使意義重大，因為它為我們留下了有關蒙古人人類學的概述——《蒙古史》。其重點是軍事情報並且提出了抵抗蒙古人的方法。

另外一次使團(由教皇因諾森四世於1245年派遣)的成員是兩名多明我會士克雷莫納和龍如美。當時他們只是把教皇的信件交給了蒙古

君主的先頭部隊。龍如美後來於1249年再次出使蒙古。他從尼科西亞出發。當時聖類思王正在那裏駐節。

盧布魯克於1252年接受法蘭克國王聖類思的決定出使。他要轉交回復蒙古大汗的信函。此信是通過龍如美於1249年轉來的。蒙古貴由大汗要求同法蘭克國王結盟，並且要求向他向蒙古人納貢。於是他派遣了佛蘭德的方濟各會士盧布魯克於1253年5月在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克里米亞。他走的是伯朗嘉賓的路程。路上發生了聖類思王信件遺失的事件，而且加上他赤足而行，衣衫破爛不堪，所以沒有能夠被作為使節受到接待。這一使節的傳教精神使得他從新大耶處獲得了可以傳播和皈依天主教的許可。這使得某些景教的神父怒火中燒（他們以敘利亞語進行傳教），而使節不會講這種語言，所以亞美尼亞的僧侶塞爾基指責他是騙子。後來他受託將一封蒙哥大汗的信轉交給法蘭克國王。這封信裏要求法蘭克國王臣服並派遣正式的使節。這封信交到了聖若昂·德·阿克雷修道院院長的手中。他未批准將此信交到法蘭克國王手裏。所以他從修道院中致函法蘭克國王，向他描述了旅行。這便是《蒙古帝國遊記》一書。這一敘述十分重要，因為它首次建議將契丹確定為塞里斯國。此外，還詳細地敘述了他所接觸的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

從中亞向中國派遣的使團也給我們留下了他們的見聞。阿魯混大臣的兒子，波斯的朮外尼是忽羅珊和伊拉克的總督。他約於1252-1253年期間出使蒙古（早盧布魯克一年）。他寫下了《世界征服史》。

現在我們再來看歐洲的情況，教皇尼古拉四世決定派遣由方濟各會出使的多個使團，企圖再次與蒙古人結盟。約翰·蒙特·科維諾於1289年出發。由於蒙古人的陸地征戰，決定在波斯灣乘船前往印度（在此逗留了13個月），然後再前往中國。他於1293年忽必烈大汗逝世前不久，抵達了漢八里。他的活動及在蒙古軍人中皈依的成就，詳細地記錄在他於1306至1307年之間發回的信件中。他被指定為漢八里主教。後又得到3個主教的輔助。他們於1313年抵達中國。當時教皇派遣了6位代表。在泉州設立了一個主教區。當他於1330年逝世時，是大汗本人要求派人來替代他。這便是1310年左右派出的。

鄂多立克於1318年離開帕多瓦。在漢八里逗留了3年。其對中國的敘述不如盧布魯克的敘述那樣精彩，但是有某些獨到之處。他涉及到了中國婦女的三寸金蓮（對此馬可波羅無任何概述），而且他是第一個涉及西藏拉薩的歐洲人。

教皇於1339年再次派遣了四位教廷使節。他們由約翰·瑪黎諾里率領，但是於1342年才抵達中國。他們獻上了一匹白蹄大黑馬，令大汗非常驚奇。約翰·瑪黎諾里在中國逗留了3、4年後回到歐洲。他給我們留下的敘述說，從約翰·蒙特·科維諾以來，北京城有好幾個教堂，在皇宮附近有一個大教堂。主教有一個很好的住所。所有的基督教教士一切費用都是由皇帝供給的。

但是最有名的是波羅一家的旅行，尤其是《馬可波羅遊記》一書家喻戶曉。通過這本書，當時以蒙古名稱“契丹”而稱呼的中國最後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波羅家二兄弟馬特和尼古拉都是威尼斯的商人。他們於1260年前往東方，1269年返回。他們在中國旅行了3年。他們帶回了一封大汗的信，要求派遣可以傳播基督教的百位聖賢。

1271至1295年間，兩個波羅兄弟又旅行了25年。這次與他們隨行的有尼古拉的兒子，即馬特的侄子馬可波羅。馬可波羅可能為忽必烈大汗服務了17年，曾數次正式出使。他們三人於1295年回到威尼斯。在1298年的一次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的戰爭中，馬可波羅在熱那亞被俘做了人質。他將他的遊記口述給了另外一個獄友比薩得魯斯提賽羅（此人為英國國王亨利三世和愛德華一世的御用作家）。這一旅遊回憶錄後來廣為傳播，名噪一時，出現了各處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標題，例如《世界奇談》和《奇跡書》，然而最有名的題目可能是《百萬》。此書有遊記敘述的人類學性質，還有中世紀人們的看法和想法，充滿了奇人異國。

連接黑海到太平洋的陸地“絲綢之路”，在蒙古人統治期間更加安全。蒙古人那廣闊的帝國〔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帝國，包括西伯利亞，俄羅斯到基輔，從波斯到敘利亞（暫時），印度，中國和中亞〕建立了一種相對的穩定。因此這些“絲綢之路”上川流不息地來往著運載香料、茶葉、絲綢和其他貴重織品，例如高級絲綢的貨物及外交代表

的商隊。1638年，中國明朝取代蒙古人之後，中國開始轉為內向，甚至禁止了海上貿易。在此期間，只有幾次例外的航行，這便是由鄭和率領的航行(1405-1433)。

17世紀，葡萄牙人鄂本多重走了陸地“絲綢之路”(在1603-1607年期間，從印度向中國旅行。他通過了帕米爾的阿富汗和戈壁灘，最後抵達了中國的城市肅州並在那裏於1607年逝世)。他因此而名垂青史，但是正由於這位耶穌會會士的功勞，才親自確證了契丹王國(來自蒙古語的地名契丹)便是“支那”(來自於梵語Cīna)。支那這個詞是由穆斯林在歐洲傳播的。我們稱之為是確證，因為首次提出這一看法的是盧布魯克。他後來的馬丁拉達及利瑪竇都有這種意見。

近代歐洲擴張中所產生的葡萄牙人的航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它對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的鬆馳起到了很大的壓力，以便葡萄牙人在華貿易合法化。中國本身內部的矛盾，再加上它對日本及美洲白銀的渴求，使得中國接受葡萄牙人定居於澳門。從這時起，陸地“絲綢之路”便讓位於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現在通過由葡萄牙人開闢的好望角航路，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不間斷，而且完全通過海道連接了歐洲(葡萄牙)和中國。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勢遠遠超過了陸地“絲綢之路”，因為一般來講，它使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更加快捷、大量、直接、安全，然而它並沒有能夠完全消滅繼續貫通中亞的陸地“絲綢之路”。

## 海上“絲綢之路”

尋找一條連接歐洲和中國的海上之路，儘管有許多危險和恐懼(這是中世紀的思維散佈的)，其目的便是克服中亞陸地“絲綢之路”的阻礙。除了這些困難，還有不斷衝擊商隊所通過的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動蕩。傳統的海道或是通過紅海或是通過波斯灣，連接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然而，越過非洲南部好望角開闢的海上通道是由葡萄牙人完成的。它不僅更加快捷，而且排除了一系列的中間商(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海道開通之前，必須依賴他們)。另一方面，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包括部分陸程。其轉運使得運費更加昂貴，此外，增加了損



壞或遺失的可能性。這便是沿著地中海海岸前往阿拉伯半島的皮特拉和利諾克路雷地方，然後在由此進入紅海的港口雷烏克的路綫。或者走一條替代的路綫，從亞利山大到埃及的紅海港口貝雷尼斯，或者是從地中海，經過卡爾赫斯，帕爾米拉，從沃洛澤西雅德到塞琉古，通過幼發拉底河流域到達波斯灣的港口斯帕希諾-查拉斯。通常而論，無論是在紅海，還是在波斯灣的入海處，這些貨物需要易手。阿拉伯人不讓歐洲人或印度人進來。一般是由他們將貨物運輸到印度海岸，然後再易手進入東南亞或中國海。有時，為了通過馬來半島，還必須將貨物轉送給陸地商隊。

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邊海地區之間並同其周邊人民建立了海上聯繫。考古資料證明，這些地區，尤其是浙江從新石器時代便已經具有了造船和航行的能力。從夏商的遺址來看，在西周時期，北部已通日本，南通越南。在戰國時期，浙江的越國、福建和廣東人民及沿海其他地區已經開始遠航。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徐福當時已經抵達日本（澶洲，約公元前219-210年）。他是秦始皇的使節，去尋找長生不老的仙藥。根據《日本書記》（卷8）的記載，絲綢可能於公元199年（神功天皇八年）被輸入日本。《三國志·魏書》稱，彩綢是魏明帝於238年贈送給日本公主的禮物。後來中日雙方不斷互派使節，這便形成歷史上有名的絲綢外交。足見這種貨物在兩國關係中的作用。據日本書籍《古事記》載，絲綢織造在仁德天皇年間（270-310）傳入日本。

早在漢朝，番禺（目前的廣州）便已經是中華帝國向東南亞航行及珍貴貨物（如珍珠、犀角、象牙、玉石和玳瑁）的貿易中樞。部分貨物來自於其他國家。西漢期間，已經建立了雷州半島（今葉縣）到印度的黃枝（係Kanchipuram的對音）的航道，由此再將貨物輸往阿拉伯和地中海。中國船隻在前往印度的航程中，停靠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和緬甸的港口。這些中國船隻輸出大量的黃金和絲綢，以換取前面提到過的當地產品。

《後漢書》記載了許多亞、歐國家使節的到來：公元84年日南（越南）和究不事（柬埔寨）。公元131年（爪哇，印度尼西亞）。公元159年和公元161年天竺（印度）。公元97年，公元120年和公元131年憐國（緬甸）。關於緬甸這樣記載說：“朝賀”並獻“幻人”。中國則“賜印綬、金

銀、綵繒各有差也”。“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擲國西南通大秦”。為了證明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確實有過海上貿易交往，在西漢墓中，雷州半島的合浦和下西洋的始發點出土了如瑪瑙、彩色玻璃、珍珠、玉石、水晶、琥珀等考古遺物。

《後漢書·大秦傳》記載：“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安息對陸地“絲綢之路”的壟斷使得中國將海上“絲綢之路”作為推銷絲綢的另一替代路線。公元97年，班超已經派遣使節甘英通過海路前往大秦國，以避開安息對陸地“絲綢之路”的壟斷，但是他僅僅到達了位於波斯灣的條芝(即Taokè地區)。公元166年，羅馬皇帝馬爾克·奧雷利·安托寧(中文中留下的名字是安敦)也派遣了一個使節通過日南(越南)來中國，帶來了象牙、犀角及玳瑁，開闢了兩國人民之間的貿易。

《三國志》記載了中國造船技術的日益完善，同時也記載了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位於長江口的吳國已經有了非常發達的航海。口岸城市如揚州、吳郡(蘇州)、會稽(紹興)、膠州、南海(廣州)及交趾(河內，越南)已經成為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當時它們都在吳國的統治之下。廣州與交趾之間的海道成為了中國南海航行的通道。公元226年，從羅馬來的一個商人秦倫從海上到達了交趾和武昌。同年，又派了兩名吳國軍官(康泰和朱應)進行海上探險，抵達了扶南(柬埔寨)。扶南在3世紀的擴張使它統治了一個廣闊的地區，成為了中國同印度和東南亞貿易、政治交往的主要的中介及工具。康泰和朱應在國外20年的情況都記錄在吳國志的扶南傳中。此書今佚，只保留下一些隻字片語，但還是記載下了這一時期同西方，尤其是和羅馬的關係。這些記載亦見於《太平廣記》。此書記載了公元284年東羅馬帝國(大秦)遣使來華。

後來有一段不穩定的時期，它破壞了“絲綢之路”的安全使用。唐朝(681-917)的穩定再次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文化方面有中國文字、飲食及服飾。紡織技術方面的織布向東方(朝鮮和日本)和向西(越南和東南亞)的傳播。在唐朝期間，海上“絲綢之路”又有了新的並行發展。廣州可以被援引為例。阿拉伯商人蘇萊曼？(851年。似乎這是外國作者第一篇關於廣州的文字描寫，流傳至今)將廣州形容成為一

個同印度洋貿易的重要城市。“當海員們從水路抵達中國時，負責接待他們的華人，將他們的貨物和人安頓在商站中。這樣的做法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貨物，以免在6個月中發生任何事件，直至最後一艘大船的到達（在同一季風季節）。華人對所有貨物徵收30%的進口稅（以實物支付），其餘由商人自由買賣。皇帝需要的東西以最高價格購買並當時付款。從來不讓商人們吃虧。在進口的貨物當中，皇帝優先購買的是樟腦。”西方人在廣州出售象牙、金條、玳瑁和內刻飾案的犀角。中國人將其作為腰帶使用。價格昂貴（每條價值可高達兩到三千迪那爾）。這些貨物都是外國商人在印度購買的。東南亞的樟腦及檀香是富人墓葬中必須使用的物品。索可特拉的蘆薈除了作為熏香外，還有藥物的用途。印度的蘆薈則認為質量最上乘。每筐的售價可高達兩百迪那爾。廣州當時出口生絲、絲綫、金、銅、銀（以銀錠的形式作為貨物出口，而不是作為貨幣）和珍珠。同時還購買大量的中國麝香。其質量遜於西藏的麝香，但價格低廉許多。通過海路，也輸入了來自僧祇的暢銷的龍涎香。蘇萊曼記載說：“在阿拉創造的眾生中，中國人最心靈手巧，善於創造。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造出比他們更好的東西來。”

在宋朝期間（960-1279），福建省，尤其是泉州（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塔稱之為刺桐）。在海外貿易方面一躍超過了廣州。義大利人一般是從黑海進口東方的貨物，阿拉伯人在華南的廣州和泉州。1330年伊本白圖塔將刺桐描述為世界上五大港口之一。另外的4個港口分別是亞利山大、克里米亞的蘇達克、印度的一個港口和廣州。馬可波羅也是從刺桐出發，沿著海路返回義大利的。他將刺桐描寫為11至14世紀中國海上貿易的主要中心。葡萄牙人也受到了有關刺桐絲綢的中世紀想像的影響。它是通過阿拉伯人和義大利人的貿易傳播的。因此，他們開始將某種絲綢取名為“cetim（緞子）”。

通過“絲綢之路”展開而不斷發展的貿易，總是取決於其通過的地區的大國的政治背景及勢力較量等。如果政治不穩定會造成危險及為使用商隊穿越草原、沙漠和高山的商人和商品增加了風險，因而開始將他們的貨物使用替代的道路運輸，於是便增加了海路的重要性。明清兩朝，外國同中國的政治及貿易關係只能夠在所謂合法的“朝貢貿易”框架內進行，及所謂的“絲綢外交”。這種貿易實際上

是一種外國使團以使團名義掩蓋的，以貢品換回絲綢和其他中國產品的方法。在古代的羅馬，絲綢曾貴過黃金。在中世紀和現代，中國以外的織造中心的產生，例如中亞、西西里，甚至在法國的里昂，降低了絲綢的價值。

在葡萄牙人抵達印度洋前約50年，中國人已經放棄了對東南亞、印度和東非海岸的海上航行。鄭和如果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肯定是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他的七下西洋(1405-1433)從太平洋航行到了東非海岸。他在歷史上留下的美名是三寶太監。他當時所指揮的船隊是世界上最大的艦隊。這些遠洋帆船被稱為“寶船”。其歷史作用已經得到了西方學者的承認，以至於德本漢將鄭和比作中國的達伽瑪。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基本上是政治性質的，以便加強新皇帝登基的合法性，同時也有一個較次要的經濟利益和進一步加深地理知識的目的。尋找被推翻的建文帝(1399-1402)是中國官方史書所說的正式目的，但不足以解釋為甚麼舉行了數次航行。在隱蔽的政治利益中，包括探查中國南部及西方國家的實力，迫使他們的首領承認中華帝國皇帝的宗主權和形式上的政治統治。從經濟角度而言，企圖再一次通過朝貢使團來加強與這些國家的正式海上貿易。最後是為了進一步加深對海上航線地理知識及這些國家特點的了解，以便增強中國海防。同時，通過這些航行來收購各種產品、香藥、異獸，以供皇宮所用。實際上，中國作為從太平洋到印度洋整個政治範疇為主導的強國和宗主國的地位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確定與經濟性質緊密聯繫，頻頻倡導外國貢使團來訪(印度洋主要的領主都向中國皇帝派遣過使節)。在出使期間，似乎允許使團代表進行某種私人貿易(史料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不是十分清楚)。在此，我們可以涉及一些當地的蘇丹或首領，如渤尼(他於1408年訪問了南京並在此逝世)、麻六甲與蘇祿國的來訪。埃及國王定時派遣攜帶貢品的使團出使明朝。作為對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回訪，麥加和麥迪那的一個代表團於1433年來到了南京。

史學家不斷地對這些航行對中國及亞洲科學知識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從地理到造船技術的發展，製圖學(屬於沿海圖)，天文學、地質學以至植物學。中國擴展了它的地理知識(土地、海洋及潮

流)，開始更加容易地獲得一些奇珍(礦、植物)和異獸(長頸鹿、斑馬、駝鳥等)。這些航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初期的政治-外交性質，成為了一種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傳播過程。從哲學、宗教思想到藝術和廣義的文化，例如成立了一所翻譯學校(四夷館)。四夷館留下了幾部很有意思的“譯語”。鄭和的隨員裏面包括了當時一些著名的中國智者，如哈三、馬歡、郭崇禮、費信和鞏珍，其中某些人為我們留下了下西洋的書籍。關於下西洋影響的書籍汗牛充棟，舉辦了許多文化及科學活動。在此，我們僅舉一例便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0-1996年間所舉辦的“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的跨化學科綜合研究計劃。

隨著下西洋的結束，成千上萬的航行的參加者，造船業及後勤人員，海上貿易人員，從給養和裝備服務的到農業和手工業的從業人員的生計受到了影響，收入銳減。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後來便參加了對走私和海盜的接濟，甚至直接參與了這些活動。隨著作為朝庭最顯著特徵的海禁政策的再次執行，中國已經失去了對亞洲海洋的控制權。50年後，葡萄牙人在16和17世紀統治了印度洋，繼之而來的是其他歐洲列強，如荷蘭與英國。

15世紀，葡萄牙人開創性地首次使用遠海航行的技術，得以繞過了非洲大陸，第一次完全通過海路將歐洲同印度(1498年)和中國(1513年)直接聯繫了起來。由於船隻的巨大運載量，現在貨物可以大量運輸，同時，只需要經過一手或是經過葡萄牙人，因此降低了運輸成本，提高了利潤。葡萄牙人之所以可以控制印度洋的海路及在整個16世紀和17世紀初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可以歸結為許多因素。其中包括對當地勢利較量的瞭解的戰略能力，葡萄牙人很快加入了印度洋及東南亞貿易的傳統區域網絡，其相應的海上軍事優勢，還有拉攏當地勢利結成外交聯盟的能力。同時，對敢於同葡萄牙人的壟斷競爭的穆斯林勢力予以堅決的打擊。需要指出的是，葡萄牙人一旦控制了印度洋傳統的“絲綢之路”之後，又進行了創新，將印度洋同大西洋連接了起來，構成了一條連續不斷的新的海上之路，繞過了非洲的好望角。通過所設立的一系列戰略據點和所建立的葡萄牙堡壘來打擊它的穆斯林敵人，並得到了某些當地政權的協助。通行證制度(這是葡萄牙人發給某些船隻的通行證件，但是需要交納一定的費用)便是這一體系最典

型的特點。儘管其貿易形式並沒對印度洋原來的貿易體系進行革新，但是一般來講，葡萄牙人已經滲透到了亞洲傳統的區域網絡之中，可以接觸到那些特產。儘管曾經想把印度洋的主要貿易納入葡萄牙人的網絡，而且是暫時達到了將它擺脫中東及原來地中海的聯繫網絡，而對於中國來講，它則加入了傳統的中國朝貢貿易體制和在其領土上安頓外國人的體系。葡萄牙船隻從里斯本到澳門的漫長旅行中，他們將所運載的在前一港口所裝載的貨物，在下一港口進行交易。從里斯本直接運往中國貨物或從中國直接運往里斯本的貨物是特殊物品，佔貨物的小部分。金和銀是葡萄牙人用來購買印度胡椒、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的主要貨物。在東南亞，他們可以用棉布來交換香料。

但是為了瞭解澳門在葡萄牙人壟斷中西貿易幾個世紀的基本作用及澳門作為一座葡中城市頑強生存的歷史，我們應該考慮到三個因素：經濟、地理和政治。澳門建立在原來海上“絲綢之路”的端點之一，即廣州市。加上明朝的海禁政策，所以使得澳門的葡萄牙人成為了中國和外國之間貿易的中介人。這樣葡萄牙人可以滿足中國人對從日本和美洲（通過菲律賓或好望角航線）來的大量白銀需求。中國人15世紀海上擴張政策的放棄其及海禁政策造成了私人貿易和中國海面海盜現象的增加，於是葡萄牙人便參加了圍剿這些海盜的戰役。從軍事和政治角度來講，葡萄牙人對中國不構成一種威脅，因為他們同意並服從一種對葡萄牙和中國的雙重效忠。葡萄牙人交納地租和海外貿易商業稅。此外，只要中國當局一有要求，他們必須向兩廣總督彙報一切。澳門的葡萄牙人，他們對於廣東地方當局來講，在經濟和政治上更有利用之處。所以，兩廣比其他地區，尤其是與其他邊海省份相比，在經濟上更有實力，因為在很長時間內，澳門是唯一的一個合法的海外貿易港口。從另一方面來講，另外一些中國官員開過先例，使得他們有機會向朝廷進貢西方的奇珍異物。葡萄牙人從17世紀中葉開始在印度洋的掌握的航綫先為荷蘭人的取代，後又為英國和法國人所取代。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儘管海上“絲綢之路”非常成功，但是它並沒有能夠完全取代或阻止陸地“絲綢之路”繼續向中亞，甚至有時向西方提供貨物。

總體來看，“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文明意義對於人類來講，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多元文化和多種族的世界。“絲綢之路”促進了許多大的中國城市和西方城市的國際化。“絲綢之路”是一系列有形的陸地或海上通道，但是通過它們所流通的不僅僅是人員和動物，不僅僅是物質財富，例如那些珍奇異寶和貴重的貨物。同時，它構成一系列最高的文化價值：從哲學和宗教、科學、科技思想，從語言到音樂，從服飾到飲食。自然，這一相互影響是雙向的：東、西方互相取長補短。

